

相克相生 共进共荣

——“京师人文宗教讲堂”讲演集(2011)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 编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相克相生 共进共荣

——“京师人文宗教讲堂”讲演集(2011)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克相生 共进共荣 /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161 - 1830 - 6

I. ①相… II. ①北… III. ①儒学 - 文集②道教 - 文集
③佛教 - 文集④中医学 - 文集 IV. ①B222. 05 - 53②B9 - 53
③R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129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王洪强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2
字 数 319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儒学系列(一)	从郭店楚简看子思学派的礼学思想	(1)
儒学系列(二)	从《仪礼·乡射礼》看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	(25)
道学系列(一)	尊道与修道	(43)
道学系列(二)	隋唐文化中的道家学说	(59)
佛学系列(一)	佛教伦理与社会道德	(95)
佛学系列(二)	中国禅宗的迅速兴起及其主要特色	(119)
儒学系列(三)	儒家及其思想精华	(128)
儒学系列(四)	从莱布尼茨和康德回归孔子：启蒙哲学中的 儒家精神	(149)
中医系列(一)	认识中医 维护健康	(173)
中医系列(二)	中医文化 养生智慧	(192)
道学系列(三)	老庄修身治国之道	(216)
道学系列(四)	道教易学综论	(253)
佛学系列(三)	华严经研究	(278)
佛学系列(四)	佛陀的言语	(297)

儒学系列(一)

从郭店楚简看子思学派的礼学思想

时间：2011年4月9日上午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

主讲：清华大学 彭林教授

主持人：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各位来宾，京师人文宗教讲堂第一讲今天就开始了。京师人文宗教讲堂由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主办。作为一个高端的学术交流平台，高端的人文宗教学术研究机构，高端的人文宗教人才培养基地，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在贯彻“三高”的宗旨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面向社会、面向同学们的普及和提高工作。今天我们的讲座就是着眼于这样的目标而开始的。

我们这个讲座实际上是要给文化交流的三个层面，政治家之间、学者之间、民众之间搭建一个桥梁，尤其是给学者和民众提供一个交流的渠道。我们面向社会，面向所有关注、关心并且愿意参与其中的人们，为我们国家的学术和中华文化的传承来做这样的工作。相信我们这样的对话会使一些民众从中受益。

今天是我们讲座的开始，所以给大家稍微说两句。我们做的是系列讲座，各位在报纸上会看到，今年展开的有儒学、道学、佛学和中医四个系列。每个系列将由十讲构成，都是在这些领域当中有着精深造诣的专家来跟大家见面交流。我们并不仅仅局限于本土的学者，在此之外还穿插有德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境外学者的演讲。也包括传统文化当中的具象性演讲，比如我们要请最顶端的国画大师、古琴大师来讲可能大众以前知道，但并没有深入接触、了解的相关专题。

今天第一讲的主讲人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经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的理事，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友彭林教授。彭林教授的头衔太多，我只是说他最基本的。彭林教授在儒学、经学、礼学上均有建树，尤其是在礼学上造诣精深，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我们今天第一讲的标题的第一个字是“礼”——举国学子们都知道，谈到“礼”躲不开彭林教授。但后面的子思、楚简与“礼”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有请彭林教授作介绍。

彭林：各位老师、各位朋友：非常荣幸，我们京师人文宗教讲堂第一讲让我来承担。刚才朱老师已经介绍了，我们这一次和下一次讲的都是关于“礼”的。古人讲“礼者，履也”。“礼”是要践行的。所以，在开讲之前我给大家提个要求：第一，《礼记》上说，听尊长讲话，不要留虚席。我到过很多地方，包括政府机关，一开会都往后坐，离老师近的地方都是空座，离门、离走道近的地方都坐满了，这样就给外来者一看，风气比较稀松，观感不好。第二，这也影响讲课。所以希望大家都往前面坐，把座位坐满。希望我们每次讲座都能这样，这样会场就比较紧凑，讲课的人与下面的人交流也更加畅通。

今天这个题，刚才朱老师已经说了，有三个关键词，核心是讲“礼”。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人物是“子思”，使得我们把这个题深入下去的是一批新出土的史料，叫“郭店楚简”。通过这三个关键词，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年来我关于“子思学派”和“礼”的关系的一些研究心得。

大家知道，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儒家是“礼治主义者”。我国自古以来一直有“礼治”和“法治”之争，即治理一个国家主要是通过“法”，还是主要通过“礼”？

孔子有一句话，叫“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主张通过道德和礼来治国。儒家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主要有三本书：《十三经》里的《周礼》、《仪礼》和《礼记》，通称《三礼》。我本人二十多年前在师大跟着赵光贤先生读研究生的时候，博士学位论文写的就是《周礼》。毕业以后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研究《仪礼》。《郭店楚简》出土之后我又研究《礼记》。所以，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在这三部礼学经典上。

在研究“礼”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受到困扰。比方说《礼记》

这本书，我们一篇篇读它，发现有些东西似乎不是讲“礼”的。最典型的是《中庸》，它里面基本上没谈什么“礼”，谈心、谈性比较多，和我们一般印象里的“礼”似乎关系不大。为什么这样一篇东西被收到《礼记》里，成为四十九篇之一？首先是它的性质，它说了什么。

它的作者究竟是谁？我们传统的说法认为是子思。但是这篇里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样的话，有人认为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才有的现象。子思是东周人，怎么可能说出秦始皇统一之后才出现的那些现象？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极度地怀疑。

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它涉及的问题太多，我是做礼的，就遇到一个问题，“周公制礼作乐”，到后面有孔子，再到后面有荀子，中间还有个孟子。我们经常说荀子是先秦礼学集大成的学者，可是在荀子以前的学者中，是没有什么人研究“礼”的。孔子《论语》里谈“礼”，都比较分散。孟子谈“礼”也不是很多。“集大成”是集了哪些大成，集了哪些人？前面是空的。如果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礼记》这样的书应该在荀子前面，是孔门七十子关于“礼”的论文集。如果我们把《礼记》摆在荀子前面，“荀子集大成”这句话就顺理成章了。如果我们把《礼记》放到汉代去，因为人家讲一定是汉代人伪造的，假托子思之名。顺序要这样摆，很多问题都不好研究了，这非常困扰我。《礼记》当中许许多多孔子的话我们不敢用。因为有一个倾向性的说法，认为《礼记》是汉儒做的。《中庸》这一篇收到《礼记》里，它和“礼”是什么关系？怎么讲“礼”讲到“中庸”去了？有没有关系？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我，同时也激发着我们去探索。我一直喜欢用这样一句话：“它拨动着人们探索的心弦”，我们一直试图想接近这个答案。下面我把我的一些思考与大家做一个交流。

“中”在中国文化里是极其重要的概念。自古以来中国人讲“中道”、“中庸”，但是近代以来，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作了过度的批判。这些批判在有的时候是扭曲的——先把它扭曲了再说它不直。所以在“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之下，传统的东西被加上不实之名，这一一直影响到今天。大概就在几个月之前，凤凰网主页上有一个栏目预告，标题就是“中庸之道还要不要”？下面一段话，“中庸之道就是做‘老好人’，不偏不倚，‘风吹两边倒’，做‘骑墙派’”。“中庸之道”我们今天还要不要讨论？其实我们看完这短短的几句话之后就知道了，写这段文字

的人没读过《中庸》。但他介绍“中庸”，实际还有要大家来批判“中庸”的意思。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中庸之道”是什么，而且说老实话，在郭店楚简出来之前，许多学者都不知道“中庸之道”是什么。

曾经有人统计过关于“中庸”这个名词的解释，有几十种说法。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不搞清楚，那么中国学术史就有一块是非常模糊的，而这一块又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一般来说，把“中”当做“德”提出来。从孔子开始，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是一种“至”也。“鲜”就是少，老百姓不知道这种东西，就是很长时间不知道“中庸之道”，所以老百姓“鲜久矣”。可是孔子明确提到“中庸”这个词的不是太多，但在许多谈话里都有“中庸”的思想。比方《论语》里，他的弟子子贡问他，师（子张）和商（子夏）这两个人孰贤？哪一个更好点？孔子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师做事老是太过头，商总是达不到。子贡就说了：“然则师愈与？”照您这么说还是师比商要好？因为他不仅达到，还过了。孔子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我们的成语“过犹不及”——“过头了”和“达不到”是一样的，都没有达到“中”的位置。这个“中”就是不偏不倚，是事物的度。“过了度”和“达不到”产生的效果完全一样，没有谁好谁不好的。

孔子死了之后，儒家开始出现了很多学派。《韩非子·显学》说当世的显学有两个：一个是儒，一个是墨。孔子死了之后儒家一分为八，墨子死了以后墨家一分为三。这里提到孔子死了之后有子张之儒。子张是孔子很重要的学生，后来在孔庙里进入了十二哲。第二个是子思。关于子思我们一会儿再细说。第三个是颜氏。我们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姓颜的大概有八个，颜高、颜祖、颜回。这个地方肯定不是讲颜回，因为颜回比孔子死得早，孔子死了之后还有以颜氏标榜的学科。孟子；漆雕氏——《论语》里有漆雕开；仲良氏——我们知道仲良氏的不多；孙氏是指荀子，读过《荀子传》的知道，有荀卿和孙卿；还有乐正氏。这段话通常被理解为孔子死了之后儒门分裂了，分为八支。今天我要讲，实际上我反对这样一种意见。我认为不是分裂，而是分蘖：这棵树有八根枝，这八根枝都有很充分的发展，从而使孔子的学术更加繁茂。当然，这八个学派我们不能说太多，只是我们现在对子思这一派比较有把握。来谈它的发展。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子的儿子叫孔鲤，字伯鱼。孔鲤死得很早，我们在《论语》里偶尔看到，问他：学诗了吗？学礼了吗？我们所知不多，

留下的东西也极少。但是他的儿子孔伋，我们根据年表排下来，在孔子死的时候才五六岁，他主要是受教于孔门高足之一的曾参。孔伋非常了不起，他是有著作的，在汉代时这个著作还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本书叫《子思》，下面一共有23篇，班固为《子思》作了注，认为子思“为鲁穆公师”。这本书一直到南北朝的时候还有。因为《隋书·音乐志》引了梁朝沈约的话，说《礼记》四十多篇里有四篇是出自《子思子》这本书：《中庸》、《缁衣》、《表記》、《坊记》。这个“坊”和“防”是一个意思，不是作坊的坊。老百姓容易犯错误，君子经常制定各种规定，要防止他们犯错误。尽管这样，老百姓总是有意无意地犯错误。这里面讲怎么预防。

写《隋书·音乐志》的人已经看不到《子思子》这本书，当时已经亡逸了，否则不会引别人的话，而是可以直接引《子思子》，但因为这时候看不到了，所以他只能引沈约的话。《礼记》49篇除少数几篇大部分作者都不可考，这四篇说是子思作的。由于我刚才讲的原因，大家对这个基本上不敢相信，因为这本书我们已经见不到了。这四篇是不是子思作的？其他三篇的重要性不如《中庸》。《中庸》是宋明理学的一个源头，到了宋朝之后专门把它从《礼记》里抽出，加上《大学》，把它与《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这篇东西影响太大了，宋代学者深信不疑。但到后来，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这样的说法，认为《中庸》与子思没有关系。

这里我们要提一个名词叫“思孟学派”，子思和孟子。关于这点，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学生。但我们把这两个人年代一排，发现根本够不上，除非子思活了一百多岁。所以《史记》里曾经说，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中间还隔了一个人——很可惜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这样两个人才接得上。我先就这么简单地说一说。

我在开头提出来的那些疑问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真正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新史料的发现。王国维（王静安）先生当年在清华有过一个演讲，认为历史上的学术大发现往往是由于新资料的发现。他提到了好几个例子，比如说殷墟甲骨的出现使我们对商代历史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提到了西晋太康年间，河南汲县一个战国的墓里——这个墓有不同说法，一般说是魏襄王，还有说是魏安釐王的。这不

是太重要——反正是战国魏的一个墓葬里，出土了大批的竹简。这就是著名的汲冢书。竹简出来了之后，当时有一批著名的学者都去研究，《竹书纪年》就是从这里面出的。《竹书纪年》出来之后，也就是从西晋一直到近代，中间几乎再没有竹简出土。一直到1993年的冬天，继汲冢书之后又一次重大的竹简出土终于来临。

湖北荆门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叫郭店。不知道大家去过荆门没有？它在江汉平原上，这里一马平川，汽车在公路上开着开着就发现路旁边有一个土包，一块平地为什么会有一个土包鼓出来？十有八九是一座墓，尽管没有墓碑之类的。再走一段又出来一个，再走一段又出来一个，回头一望都在一条线上。那些墓现在都被保护着，我们不去主动发掘，是因为技术不够，弄不好，发掘就成了破坏。

郭店一号楚墓是被人盗掘后才发现的。地面上看不到什么东西，只有几棵树。盗洞里面全是水，水面上浮着很多像面条一样的东西——竹简在地底下浸泡了两千多年，里面都饱和了，浮在上面都拿不起来，一拿就断——仔细一看，上面有字。盗墓的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没要。考古学家用板子把它们一根一根取了出来。考古学家非常智慧，他们用了化学的方法把里面的水置换出来——既然水能渗进去，我就有办法让你再跑出来——这叫脱水。经过脱水之后，这个竹简简直跟新的一样，上面用毛笔蘸着漆写的字，到现在还是发亮的。我们曾经有机会到郭店开过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那里参观了这批文物。经过清理，有730支竹简上面是有字的。从痕迹上可以看到，这些竹简原本是用绳子编连起来的，但绳子已经完全烂了，没有了。所以简的顺序我们已经不知道。整理的专家就根据竹简的长短和形制对它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在这个基础上，再按内容分篇。最后发现里面有两篇东西是道家的作品，一篇是《老子》，老子有三个抄本：甲本、乙本、丙本——这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非常像，马王堆出土的有帛书《老子》。还有一篇是令海内外学术界瞠目结舌的《太一生水》。里面提出的宇宙生成的顺序，让所有人感到莫名其妙，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太一生水》说的生，不是父亲和儿子的单向关系，太一生水之后，水又反哺太一，然后再往下生。关于这一篇的讨论非常热烈，我们现在一般认为这是属于道家的作品。其他还有14篇。让我们特别惊喜的比如《鲁穆公问子思》——刚才说班固的著作说子思做过鲁穆公的老师，果然有一篇是《鲁穆公问子思》。此外还有《穷达以时》、《五行》、《唐

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都是成篇的文字。后面还有四篇，就像语录一样，都是很短很短的一句，这个简没写完就停了换着写，整理之后给它取名叫《语丛》。《语丛》里有《论语》的话，所以这14篇被认为都是儒家的著作，里面绝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的儒家著作，所以非常宝贵。大家很关心这个墓葬的年代，因为它和竹简的年代是紧密相关的。考古学家根据地层和附近出土的其他楚墓的器物、器形的类比，推定这个墓大约是公元前35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战国中期偏早。竹简的年代应该比墓葬要早，这个年代正好与子思生活的年代是吻合的。里面有一篇最著名的叫《性自命出》，我们读完以后发现和《中庸》的思想完全是贯通的，所以研究者断定这些儒家作品是“子思学派”的作品。

这14篇里有两篇是我们要特别提到的，一篇叫《缁衣》。刚才我说了，《中庸》、《缁衣》、《表记》、《坊记》四篇，以前有人说是《子思子》这本书里的，但是很多人怀疑。如今这篇东西竟然在墓里找到了，这个墓是战国的，我们拿这篇竹简的《缁衣》去与《礼记》里的《缁衣》进行比较，几乎是一样的。尤其有意思的是，它在每一章写完之后，都用墨弄了一个方块，不是圆的，黑色的一块东西——术语叫墨钉隔开了，紧接着往下抄。抄完了一章在简中间再用一个墨钉隔开。到最后一支简，上书这么几个字：“二十有三”，一共有23章。说明这篇东西是完整的，一章都没缺，但是二十三章的顺序和今天所见到的传本不太一样，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发现简本的顺序是合理的，经本的顺序，逻辑有点乱。当然，两个本子在写法上、文字的多寡上不尽相同。裘锡圭先生认为，竹简的本子年代更早。现在所见的《礼记》的本子经过汉代人的整理，有一些顺序摆得不好，里面多出来的两章很可能是在郭店楚简之后有人添上去的。郭店楚简的出现，使得我们有理由认定《子思子》确实是先秦子思所著。让我们非常兴奋的是，后来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买回来一批楚简，其中也有《缁衣》这一篇。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非常兴奋，专程跑到上海，得到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李朝远先生的特许，到上海博物馆的库房里把简拿出来，我把抄在本子上的郭店楚简的《缁衣》和它的《缁衣》比对，几乎是一样的。这证明战国中期偏早，在不同的地方已经有不同的抄本。

后来又传出消息，香港大学著名教授饶宗颐先生通过其他途径也买到

几枚竹简，其中一枚就是《缁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把《缁衣》和《中庸》、《表記》、《坊记》放在一起看，发现这四篇和《礼记》其他各篇体例不太一样，几乎都说孔子怎么说，《诗》怎么说，《书》怎么说，以此来印证孔子的话，非常特别。所以到今天，我们有理由说，沈约关于《子思子》的说法是可信的，“子思学派”是成立的。这没有太大的争议。

另外一篇是《五行》，也非常有意思。当年马王堆出土了一批帛书，里面有《老子》。抄完了《老子》这块帛还有一块地方，就接了《五行》。但举国上下的兴奋点都集中在帛书《老子》上面，《五行》没有人关注。后来学术界著名学者庞朴——现在已经80多岁了——对《五行》作了研究，解决了一个著名的学术难题。《荀子》里有一篇《非十二子》——“非”就是非难、批评——批评子思、孟子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他们提出“五行说”。我们一提到“五行”，传统观念里马上就想到金木水火土，但我们看孟子的书，他从来不说金木水火土。而子思的东西我们又看不到，荀子这么说就让所有人感到不能接受，不能理解。结果这篇出来才知道，“五行”是五种德行——仁、义、礼、智、圣。郭店楚简出了一篇，也叫《五行》，但文字比帛书的《五行》要少。我们把两个《五行》一对照就发现，帛书的《五行》分“经”和“书”，就是“经文”和后面的“书简”两部分。郭店楚简只有“经”没有“书”。把二者加以比较之后发现，郭店《五行》是一种更原始的形态。这就又进一步证明了思孟学派的存在。《缁衣》和《五行》在同一个墓里，有《五行》。后面《性自命出》里还有与《中庸》有关的。

郭店楚简的出土，让所有人欢欣鼓舞。记得《郭店楚墓竹简》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我还在师大——我印象太深了，那天下着小雨，有人把书拿给我。在读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竟然有一段是《礼记》里的！把《礼记》找出来跟它一对比，那些不认识的字完全可以对译出来。那天中午我没有睡觉，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三天以后，国际儒学联合会给我发通知，说马上要在炎黄艺术馆举办郭店楚简学术讨论会，希望我能参加。这么巧，我刚写完他们就通知了。其实是非常偶然的发现，“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不是我比别人高明，只是给了我一个机会。

这批竹简在思想历史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从孔子到孟子，中间隔了一百七十多年。一百七十多年孔孟思想虽然是相承的，但中间是有变化的。最突出的，《论语》里说孔子“罕言性与天命”。这句话

以前大家看不懂，确实孔子很少谈心、谈性、谈天命，但到《孟子》里“心性论”，谈心谈性，有《尽心上》、《尽心下》，“性善”、“性恶”。原本大家不谈，后来都谈起来了，是什么样的转换才兴起这个热潮？以前我们没有材料，没有办法叙述。而郭店楚简正好处于孔孟之间——当时庞朴先生写了一篇《孔孟之间》，指出它思想史上的定位是在孔子和孟子之间。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研究早期心情论的一些缺环被发现。

下面我们谈一下“子思学派”学理上是怎样的。通常来讲，一个思想家或一个学派提出一套治国理论时必不可少的工作是，这套理论与民众有没有交集。如果说了半天，民众发现跟他们没有关系，大家就对你不感兴趣。交集找得越准，这个理论的针对性就越强，普世性也就越强。中国人很看重这个。《中庸》讲“道不远人”，“道”总是离我们最近的。《论语》讲“切问而近思”，一定要从切于我们身心的地方提出道。“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一定要被大家接受，一定要离大家最近。

竹简里很多话非常棒，很多书里没有，先秦儒家的智慧不得了。那时候“子思学派”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治民。思想家、政治家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要治民和治国，治民和治国是要一致的。怎么样才能把老百姓治好，我一定要找到和老百姓切身特点的交集。郭店楚简里大量的地方讨论“道”，很有意思。“民可道也”，这个“道”要念成“导”，老百姓只可引导他，“而不可强也”，你不能强迫他，只能因势利导。“不由其道，虽尧（是指圣人）求之弗得也。”一定要找到“道”，找到“道”才能把事情做成，把人民治理好。

《尊德义》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精辟。古代“言必称三代”，一追就追到夏商周。“禹以人道治其民”，大禹很聪明，治水知道要用水之道，治民知道要用人道。到了夏朝末代君王桀，“以人道乱其民”——他有他的道，这个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人民还是那些人民，在人家手里治得好好的，到他手里乱了，结果灭亡了。之后，“商汤（开国君王）不易桀民而后治之”，在桀手上一塌糊涂的老百姓，在他手上治好了。这里面是说有没有得“道”。

下面展开论述，“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讲得通俗一点，你牵一个牛，让牛跟你走，不是拉它的脚，不是踢它的屁股，而是要牵牛的鼻子。“禹之行水，水之道也”，大禹治水的时候，历史上有一个洪荒时代，

据研究说，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之前，我们这片大地只有泰山是露出水面的。造山运动之后，西高东低，水都往海里流，但许多地方都有沼泽和大洪水聚集。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不知水之道，水在哪里出现他就垒土，垒成墙去堵，结果水就往别的地方流，他又到那个地方堵。最后水没有地方可走，就把墙冲破造成更大的灾难。他不知水之道。禹知道水的性质是朝下流，所以他不堵，总是疏导。站在山上，哪个地方低就挖沟把水排下去。最后他成功了。“造父之御马”，造父是秦国的一个先祖，马是从西域那边传进来的。徐中舒先生研究过，马、牛这些大动物在史前时代我们没有，考古发现果然如此。秦和西域比较近，造父御的这四匹马最有名，而且他们养马都养得特别好，他知道“马之道”。“后稷之艺地”，后稷是周人的始祖。这个人很有意思，在玩的时候喜欢种东西。后来大概了解到土质有的是酸性的，有的是盐性的，有的是沙土。不同的土要种不同的东西，所以他成功了，这是他了解了地之道。“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为什么后来会一步步推出那么多东西，是从治国之道，治民之道，用防水、御马、种地引出“人道”的问题。所以，儒家很有意思，“凡动民（动用老百姓），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民心有一定之规的，总是与“道”有关。一个执政者“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看问题不抓到它的来由和根本；“虽强之，弗纳也”，你强迫他，他不接受。“上不以其道，民从之也难”，所以我们今天提出政策要人性化，其实追本溯源可以追溯到子思这儿，要符合人性，“牛不喝水强按头”是按不下去的，要顺应民心。

儒家就把它的道理建立在人性上。牛有牛性、马有马性、人有人性，只要你的东西是切合人性的，就能被所有的人认同。它里面提出来“四海之内，其性一也”。人性是相通的，所以要抓住这个东西，只要是人就有人性。我研究自身的人性就可以知道别人，“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道生命里给我们带来什么。“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大小戴《礼记》里对人性的思想都有类似的表述，只不过竹简出现之后我们更坚信这些话，以后敢用了。“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同学们，这是一句了不起的话。商朝时一个贵族的人死了，要有几十人、几百人给他殉葬，人生命价值是不被尊重的。周公制礼作乐之后，中国民本主义思想开始抬头，我们知道生命是可贵的，是要得到尊重的。所以，西周以后的墓葬很少见有殉葬的。

到了子思这里，这个东西又被提升了一步，我们不仅要尊重人的生命，而且要尊重人的情感，要尊重“人道”。每一个执政者要按照“人道”来治天下。“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了解他长期的生活以及他的生命里来的这样一种情，对治国治民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出发点。“凡人皆有性”，“凡有血气者（只要是个活人），皆有喜有怒……”，后面的地方我们读得不是太懂，好恶，都是人性。《性自命出》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我们今天叫喜怒哀乐，那时候人的说话习惯跟我们不太一样。《大戴礼记》说“民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这个又不太一样，语言习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大家比较一致的说法。那时候是各自提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讲人的情感。

子思学派认为人是情感的动物，这个话说得很有道理。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喜怒哀乐之中，每个人都被情感所驱使，所折磨。我们看的哪部电影不讲情感？——甚至有些作者拼命在里面煽情——离开了情我们就成了木头，每天有好，有恶，有喜，有怒，有哀，有乐，我们一生就在这里面度过的。所以他抓住人有喜怒哀乐，这其实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的情感是一样的，你不喜欢饥饿，为什么让别人饥饿？你不喜欢战争，为什么把伊拉克推入了战争的火海？你不希望自己国家的人民失业，为什么要让人民币升值，让我们的人民失业？这没有道理，不宽厚。将心比心，人同此心，情同此理。我们抓住这个情，只要我们了解自己，别人也是一样，我们就知道这个人道应该怎么走。

儒家，准确地说“子思学派”提出了三组或三对概念。

第一组叫性情。我们今天讲性情是连讲，其实没把它细分，在古代这个分得很清楚。“性”是与生俱来的，生下来就有。不需要而有，不教而能的东西叫“性”。晚上睡着了，喜怒哀乐的能力都有，但是你看不见。“及其见于外”——发出来就叫情，你可以看到我的喜怒哀乐，“则物取之也”——我眼睛一睁，外物在刺激我，这时候我就迅速作出反应，是喜，是怒，还是别的什么。性和情的关系，性是我们发出情的一种本能，一种能力，是深藏于我们生命体的内部，在没有外物作用的情况下它是看不见的。

郭店楚简里还有句话，太棒了。它打了一个比方，“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我作了一个钟或者作了一个磬——这个“金”古代是指铜。今

天的金叫黄金；“石”是古代作的打击乐器。金和石就是钟和磬作好后，已经具备了一种发声的能力，但你不去敲它，它不发声，一敲它就出声了。它的性就是发出来被你听到。好比我们一个人晚上睡着了，是有情的，但外物没有刺激它不出来，外物一刺激，好比一敲钟，情就发出来了。下面我们要说到问题的核心部分。

《中庸》一开头有几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在以前人人都能说出来的，不识字的人都耳熟能详。这三句话说的是什么？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里面出现的文字几乎跟它是一样的。“性自命出”，喜怒哀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生命里来的，一个生命诞生了，这个东西就有。命从哪里来的？天降的。以前我们说“天降万物”，我们人和万物都是天地生的，我们的生命是天给的。这八个字并起来就是“天命之谓性”，一个说得松一点，一个说得紧一点。下面说到“道”，“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我们制定政策要遵循人道，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中国儒家特别重人情，特别重人性，应该说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重视人情，但不像道家那样，道家也重人情，但是跟儒家不同。儒家觉得这个“情”可以为我所用，可以拿来加以引导，说一个人的真情实感总是能打动人，“凡人情为可悦也”——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哭得这么伤心觉得太好玩了；这么小的年纪，他笑得那么开心我们也被打动了。这个人情被我们高度认同。“苟以其情，虽过不恶”，这个人只要是真情，有时候过了一点，大家觉得都能理解。“不以其情，虽难不贵”，不是真情，是假的，是电影演员装出来的，表演难度很大，但这不是真的，“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只要你是真情，还没哭出来，还没笑出来，我一看这个人眼睛里有发光的东西，我就知道这个人被感动了。

真情是最能跟别人沟通的，最能引起人家共鸣的。《成之闻之》里有这样一句话，“君衿冕立于阼”——衣和裳的颜色一样叫“衿”（上面叫衣，下面叫裳）；冕就是帽子。这是宗庙大祭的时候《礼记·祭统》里的一段话：大祭之前国君跟后（夫人）两个人一起来到太庙，“君衿冕而立于阼”——同样的一句话在郭店楚简里面出现——所有的人马上起了恭敬心，去祭祀的时候很诚，很庄重，“一宫之人不胜其敬”，所有人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君衰经而处位”——以前的丧服前面有块布，这块布

叫“衰”；“经”是在头上用一个麻绳弄一个圈，这叫首经；腰里还有一个圈叫腰经。现在都是用白布围一下。一个国君穿着丧服站在哭位上，“一宫之人不胜其哀”。“一军之人不胜其勇”，在战前动员的时候，如果国君慷慨激昂，三军将士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上苟昌之，民鲜不从矣。”人情是很重要的，人情既然是天命给予我们的，我们要尊重它，要让它恰到好处地在社会生活里发挥作用。

《中庸》的第一句叫“天命之谓性”，以前我们把这个“命”解释为命令，郭店楚简出来之后我们发现不对，天和生命里带来的叫性。第二句“率性之谓道”，这个率就是当循、沿着，沿着人性去管理人民，庶几乎就是人道。这里的“率”作“循”讲，《诗经》、《尔雅》、《尚书》用“率”最多的一种方法就是沿，沿着人性去治理人民，就找到了人道。

前面一组概念是性和情。下面一组概念是“心”与“志”。

大家想想，睡着了没有知觉，“性”深藏不露。睁开眼睛，外物刺激之后情就发出来了。按照这个逻辑，同样的事情刺激不同的人，大家发出来的情应该是一样的。同样的东西进行作用，我能让他这样，也能让你那样。但现实社会中不是这样，举个例子，我拿些鸦片放在同学甲面前，同学甲说这不行，这绝对碰都不能碰。我放在同学乙面前，同学乙说这是好东西！同一个东西刺激不同的人，为什么出现不同的情感反应？所以我们必须从“性”和“情”出发再往深层里找，看有什么在左右它。儒家就发现里面有个“心”。“心”对外来刺激作出判断，然后对“性”进行调动，这时候我该喜还是该悲，还是该怒。“心”是我们内心的枢纽，决定哪一种情感出来的枢纽。所以它里面说到，为什么同一个物质刺激不同的人，我们会作出不同的反应。这里说了“凡人虽有性”，尽管都有性，可是“心无定志”。心会有一个“志”，这个“志”就是心往哪里去。我们经常讲志向，小孩说我长大了立志要做科学家，把心的去向立定了叫立志。这要经过后天的教育培养，这个志才定，在这之前是“心无定志”。这个“志”怎么才能定呢？“待物而后作”，要等待某种东西来刺激，才能“作”起来。等到反复实践，“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我们有一个心理定式，有一个价值判断，这是长期要接受外物的刺激，进行判断，进行分析，甚至要生命的体验，叫“悦”，而后“志”就定下了。

古人是很有意思的，探讨一个人怎么样要有德，“德弗志不成”，要做个得道之人，有德之人，这个志老不定也不可能。“权，然后知轻重”，